

·探索与争鸣·

胡说体育文化

胡小明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体育的“学”，是文化。从《体育学通讯》到《体育学刊》，是传播文化载体；《体育学刊》现在已经出版100期了，表明它承载体育文化的厚重。

“文化”一词，在西方源于拉丁文 *cultura*，原义是指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15世纪后逐渐引申为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而到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具有了独立的抽象含义。咱年轻的时候缺文化，认为它就是读书写字的能力，领悟到它是每一个人后天学到的东西——作为人类成员之一，为了参与群体交往活动中被接受而必需了解的知识。待到学会一点读书写字后，又觉得它主要是代表人类精神财富的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在美学光环的笼罩下愈加神秘得深不可测，奥妙无穷。

改革开放初期，神州大地掀起文化热，记得标志性事件是1985年美国杜克大学詹姆逊教授^[1]应邀在北京大学开设系列讲座，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致使《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启蒙读物，也为体育的价值评估开了一扇天窗。那时，咱思想解放了啥都敢想，可谓无知者无畏，与一群对体育文化抱有同样浓厚兴趣的小青年自发组织“体育文化沙龙”，每周数晚聚在一起喝咖啡谈文化，持续数年；1986年在成都体育学院召开“全国首届体育文化研讨会”，居然还有不少文化界和体育界的知名教授争先恐后抒发见解，一时体育文化炙手可热。

20多年过去了，这样群体性自发研究体育文化的事已成为中国体育文化思潮中难得的涟漪。国内虽然再也没有出现自发研究体育文化的群体，但相关论文和专著屡见不鲜，官方还成立了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全国建立了几十个重点研究基地，审批了大批可用作职称晋升依据的课题……在各种各样官方组织的体育文化论坛里，不少激情青年奋不顾身冲进体育的“文化光晕”中，绝没想到多年后可能两鬓斑白悻悻而去，鲜见捧出有价值的成果。在这样前仆后继的悲壮过程中，热爱文化的学子遇到同样的问题：如何研究体育

文化？

回想咱最初对文化研究感兴趣时，也是想当然的以为先把文化的定义搞清楚，再用这个定义去套体育，一切问题均可迎刃而解。一头扎进去许久，发现却并非那么一回事。“文化”是学术研究中最复杂的术语之一，体育文化研究者选择以此作为最初的切入点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什么是文化？此问题与“什么是体育”一样，恐怕只宜意会。这样的问题就这样说出来似乎大家还清楚；一旦解剖分析，众人立马腾云驾雾，最后连自己也搞晕。咱常对学生说，如果想上天堂，去研究文化——会给你带来美不胜收的精神享受；如果想下地狱，也去研究文化——可以轻易耗尽你一生精力，最终仍然可能糊里糊涂。

“文化”这个词有太多的解释。不仅中国和外国对“文化”的解读有明显差别，古今对“文化”的理解也大相径庭。最早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文化”定义，首推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他在1865年出版的《关于人类早期历史和文明发展的研究》一书中，对“文化”概念进行了初步的界定，在《原始文化》中，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定义：

“文化是一个综合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的其他能力和形成的习惯。”^[2]这之后，自1871~1951年的80年里，关于文化的定义竟有164种之多。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新的解释难以计数。多少学者试图界定文化的概念，然而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可见，给文化下一个严格和精确的定义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按照词典的解释，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文化”一词为文治教化之意，而时髦一点的几乎将其视为“文明”，即人类所创财富的总和。咱觉得，文化的特定含义，应该主要是看不见摸不着

收稿日期：2010-03-02

作者简介：胡小明（1952-），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人类学、体育美学。

的形而上部分。虽然许多场合在广义上使用文化概念,但硬搬到体育里却不妥。赞同文化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的人们可能觉得这样省事,哪知却陷入深不见底的泥潭,结果是把文化与人类有关的一切画上等号,无所不包,最终导致“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那么,这样定义的“体育”与“体育文化”并没什么区别,只是换了个看似高雅而实际累赘的语词使别人更晕而已。

既然难以给文化下定义,那就尝试一下把握研究对象的具体范围。文化研究是针对一个人还是一群人?把文化分为个人和群体两类的尝试早已有之。如人类学者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文化定义可以归纳为两种,一为社会结构意义上的文化,另一是个体行为意义上的文化。前者指的是一个整体社会中长期、普遍起作用的行为模式和行动的实际准则。尽管文化的意义里含有个体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强烈特征,但研究体育文化最好从群体着手。英国人类学家弗思认为,文化就是社会;社会是什么,文化就是什么。他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组织要素》一书中指出,如果认为社会是由一群具有特定生活方式的人组成的,那么文化就是生活方式。这样把文化等同于社会的观点虽然有学理依据,但有些极端,用于体育研究似乎无从下手。社会包罗万象,而体育文化的研究必须从漫无边际的状况收缩到可以把握的范围;何况,体育文化研究不能和社会学划等号,以避免淹没于泛泛的社会研究中。

毋庸置疑,文化要素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是精神文化。它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动力,主要指哲学和其他具体科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其中,价值观念是精神文化的核心。还有语言符号、规范体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当然还可以包括凝聚着人的观念、需求和能力的物质产品等,不过,最重要的是为一个社会或群体的全体成员共同接受和遵循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核心有一个连续不断的积累过程,每一代人都出生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并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逐渐积淀为传统文化。

那么,体育文化的研究对象以什么为基础呢?理应以民族文化为基础。现代进化论者摒弃了达尔文把个体作为生物进化基本单位的观点,认为应当把群体作为进化的基本单位。因此,对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以民族为单位,即研究民族的文化,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在按照北美的学术传统,狭义的文化人类学不包括语言学和考古学,几乎可以等同于民族学。曾以《菊与刀》而闻名于世的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3]曾说:文化就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

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一个民族使用共同的语言,遵守共同的风俗习惯,养成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性格,此即民族文化的表现。研究体育文化,主要应针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对体育运动的影响。恰如余秋雨先生所言,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以及与此相呼应的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何谓中华民族体育活动中的集体人格或国民性?此亦为我国体育文化研究者的聚焦点。

人类历史上的各文明古国,只有中国文化作为绵延不断的文化主体保留至今;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体育的影响,应该是咱们研究体育文化的基础和重点。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研究主要在精神文化的观念层面,而非体育的物态部分。以前的体育文史研究,是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从整理历史资料的角度来揭示文化差异;当体育史研究成熟到几乎穷尽到所有角落时,从“文史”转移到“文化”,其注意力必然集中到国民性格对开展体育活动的影响上来。所谓中国特色的体育道路,实际上强调的就是中华民族自身文化的特色。

按照人类学的理论,文化应该多元,文化需要多样性,文化常常指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但当代体育的主体却是一元纵横,需要改善成一元为主的多元共存状态。当代体育在其成熟期已经形成一种不可逆的以西方为主流的文化,“多元共存”实际上是以主流文化为平台对各种文化的吸纳与整合。现实里,中华民族的身体文化早已被西方体育文化碾轧得七零八落,体育文化研究者必须花很大的力气加以凝练重构,才能使其进入到中国体育的核心价值观层面,成为多元中的一元。

文化一旦固化为科技,就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显然,具有普世适用价值的许多体育知识、技术、规则、场地器材是人类共有的文明财富,无论如何也难以与“文化多元”联系起来。最糟糕的事莫过于不仅把自己说不清楚的事虚玄化为“文化”,还把那些具体的运动项目都说成是文化,在全世界都认同的规则中强调所谓“差异”和“多样性”,甚至上纲上线到“中国特色”,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把运动项目最后都折腾成中国足球那样惨不忍睹的下场。所谓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足球发展道路之类的提法,只能唤起世人对践踏科学文化普世价值的深切担忧。

在西方,最早的“文化”几乎都是人类学意义的解读,就是“原始文化”的缩略语。体育界醉心于文化研究者需要明白,几乎所有的文化理论都产生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咱有幸于20世纪90年代末迁徙到华南师范大学教书,从美学行走到人类学,对文化理

论略加理解,深感若不读一批文化人类学的经典名著,研究体育文化是难以入门的。

有关文化的理论中最早和影响最大的,当属受达尔文等生物进化思想的影响而提出的文化和社会的进化观。代表人物泰勒、摩尔根、斯宾塞、弗雷泽等学者,认为人类文化同步的纵向发展,将达到共同的终点。《物种起源》^[4]面世12年之后,1871年泰勒出版了他最为有名的代表作——《原始文化》;同年,达尔文^[5]也出版了对人类学影响最大的著作《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泰勒曾赴墨西哥等地考察,收集人类学资料并出版专著。他分析全世界数百个不同社会的情况后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与体质的进化相似,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可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3个阶段。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又对未来阶段的形成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泰勒的思想对体育研究影响较大的是文化残存说,即指某些古老的文化现象虽然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和意义,但仍然以一种残余物的形式留存于现在的社会中。因此,通过考察这些文化残余物,就可以重新构建旧有的文化结构,进而重建人类文化的发展进化史。这种学说被美国学者作为建立体育人类学的理论依据。进化学派是最早引进并在中国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不过,很多人误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忽视了自然界更多的是盲目的“演化”,本无所谓进还是退,很难证实存在从低等到高等的规律;进化论套用于社会文化,就会带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弊端,使世界变得不和谐。以单线性的进化理论来看体育文化,难免得出农耕土壤里的中华传统体育落后于作为工业文明产物的西方体育的结论。况且,进化论的“适者生存”,并不等于“弱肉强食”;进而引申出“在斗争中求生存”的军事化体育思维方式则更有问题。至于优胜劣汰的“金牌意识”是如何受进化论影响,也需要认真考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典进化论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一些缺陷暴露了出来,出现了反对进化论的传播论,认为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之所以类似,很少是因为共同进化的原因,而多是由某个地方一次产生并向各地传播造成的。文化的采借多于发明;不同文化间的相同性是许多文化圈(区域)相交的结果。不同文化之间的横向联系,构建了人类文化史。德奥学派领军者拉策尔根据古典进化论者巴斯蒂安的地理环境概念,用实证的方法开创了文化传播的研究,认为自然对个人以及通过个人对整个民族的体质和精神的影响,是起决定作用的。但是他的学生和后继者,如费罗贝纽斯、施米特等却把传播论引向极端。在英国受里弗斯的影响,出现了“极端传播主义”或称“泛

埃及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史密斯和佩里的推波助澜使传播论广受质疑而衰落。传播论者在研究中提出“文化圈”和“文化层”的概念,前者指文化在空间上的扩散,后者指文化在时间上的积累。后来美国历史学派所提出的“文化区”、“文化丛”概念,与之虽形式不同,实质却相差不远。传播论对西方体育风靡全球提供了某种诠释,对于研究西方体育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圈层理论也被有限地用于某些运动项目的波及地域。如按照德奥传播学派的观点,文化与自然现象不同,文化历史现象不会重复出现,人们不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年代创造出相同的文化,存在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的相似的文化现象是由文化传播造成的,这当然可以用来解释奥林匹克运动的传播。但令人遗憾的是,从西方体育光明正大进入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实实在在的传播过程,国内很少采用传播论进行诠释;而在东方古国产生为了金牌不顾一切(所谓“一金遮百丑”)的扭曲,从足球硬要走“中国特色道路”,可以看出传统文化的固执,传播以后的复杂结果则远非传播论可以解释。

针对进化学派和传播学派中常见的忽视各民族文化自身的发展历史,单靠思辨性理论归纳、简单拼凑人类文化进化图像及欧洲中心论等缺陷,由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创立的历史批评学派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工作范式。该学派以实证论和经验论为哲学基础,以历史特殊论为基本方法论,以文化相对主义为共同规范,不提倡原则性的理论概括,力主对有限范围内的具体现象做详尽精确的描述和记录。他们认为,只有具体的东西才是历史的而且才是可信的,通过思辨归纳和简单化比较所得出的抽象理论或规律是靠不住的;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过去许多历史因素作用下的产物;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特殊的历史,因此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独特的。任何文化特质或元素,都必须首先依据它在某一独特的文化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它与所属文化的价值系统等关系加以解释和判断。博厄斯的弟子本尼迪克特^[6]出版的名著《文化模式》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文化模式,必须从研究每个民族的特殊历史开始,通过局部的研究了解整体。而克鲁伯提出文化是一种普遍的、超生物、超个体的独立形态统一体,可借助“文化地区”、“文化模式”等概念来研究一个特定地理区内各种社会群体的基本特征与不同文化环境里的适应方式。他们深信,科学的工作就是观察现象、搜集和积累资料,只要资料积累得足够完全,自然能归纳出理论或规律。该学派所开创的文化区域论、年代-区域说、文化类型与文化

模式研究、文化独立(实体)论、文化价值平等观等领域,后来分别发展成文化生态学、民族心理学、文化相对论、多线进化论等分支学科和理论流派。这个流派所提倡的实证研究方法,在民族体育文化研究中尚有相当大的拓展空间。

以马林诺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为代表的学者强调文化功能论,认为文化是一个整合的系统,在一个特定共同体中,文化的每一个因素都扮演一特定的角色,具有特定的功能;需要了解各个组成部分对整体的贡献及相互关系。布朗与马林诺夫斯基不同的是,认为文化是在社会层次上而不是在个人需求层次上发挥功能的,文化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社会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是 20 世纪初最早在中国提倡实地调查的北大教授陶孟和在英国的同学,也是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斯基的理论核心“文化功能论”是以功能眼光来解释一切人类学事实,看这些事实在文化体系内的地位以及各部分怎样地互相联系,对国内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学派。此外,还有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人类学和社会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结构主义的影响还波及到了其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其热潮才渐趋减弱。由于这个学派对中国的特殊影响,体育界常把体育文化分为器物、制度、观念 3 个层面。而用这种流行近百年的理论来分析,中国长期处于全盘接受西方体育文化的器物层面,对制度仅在近年部分接受,对观念则仍然处于排斥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迅速完成了器物层面与国际的接轨,正在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而观念层面的障碍,比如对奥林匹克精神、体育权利、游戏宗旨、生命乐趣、运动家风度等普世性原则的缺乏认同,仍然是中国体育进步的最深层面的阻力。尽管这个学派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影响很大,国内体育界的学者习惯采用功能学派理论的平面结构视角来对体育文化分层切块,但脱离马林诺斯基倡导的田野调查实证研究去寻求体育文化系统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的努力往往是徒劳无益的。值得注意的是,创建了法国《社会学年鉴》并以此形成学派的社会学奠基人之一涂尔干,主张把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民族学的实地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涂尔干与他的学术继承人莫斯的理论观点,影响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结构功能学派。国内体育界依据社会事实或社会组织的需要来解释体育文化,导致了体育社会学的兴盛。

20 世纪 30 年代,经过改良的学派——新进化论重新崛起,代表人物怀特认为:每人每年所获得的能量是衡量文化进化阶段的惟一指标,从单线进化到普遍进化;另一位学者斯图尔特被公认为文化生态学的创始人。他 1955 年出版的著作《文化变迁论》倡导多线进化论,现已发展成一门探究人与环境关系的学科——生态人类学。如此看来,人文社会学科的各种理论都不能说是绝对真理,都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不同的视角,各有长处和不足,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应该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适宜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解释和说明。较之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其它如心理学、认知学、文化阐释学等各种理论、学说和观点,文化生态的理论似乎更有利于体育文化的发展。不过,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与文化相对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所倡导的文化解释理论以及“地方性知识”的观念,给体育文化带来了新的路径,由此而分化出的阐释人类学对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具有新兴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人类学以文化作为奠基性的研究对象,把一种文化视为一个群体的独特生活方式,认为文化表达了某种意义和价值标准,对文化进行分析工作,揭示特定文化中的意义和价值标准。按理说,采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文化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1949 年后的大陆学界,文化人类学这一欧美学术界普遍使用的名称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苏联学科体系中人类学仅指体质人类学,民族学被认为是属于历史科学的一门学科,这种历史性的割裂使文化研究出现了数十年的空白。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研究虽很热闹也很有成绩,但成为一门学科尚有质疑,目前至多可称其为“一门学问”,这与国内人类学研究有数十年的断代有关。体育文化的研究,缺乏人类学文化理论和方法的学习,也一直按照以前苏联为中介的欧陆传统依附于体育史,停留对二、三手材料的一般哲理分析,鲜有能与学术界交流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最早定义文化概念的泰勒、马克思推崇的《古代社会》作者摩尔根^[7]、倡导田野调查的领军人物马林诺斯基、美国 20 世纪上半叶的学术巨头博厄斯,以及象征人类学的核心人物格尔兹,均有长期、多次的实地考察经历,都是通过对真实对象的直接观察和记录而创新了文化理论。国内体育文化研究者应该认真学习这种实地考察的研究路径,特别要接受文化人类学特有的田野调查方法并付诸于实践,才能获得有点分量的成果。

20 世纪下半叶,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大众文化与休闲活动的商业化,欧美学术界兴起了文化研究的

热潮。学者们普遍采用的大多不是哲学和文化史学的研究取向，而仍然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取向。虽然其研究对象已从原始文化转向了现代流行文化，但仍然围绕“模式化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反应方式”，既针对政治威权自上而下进行社会控制的大众文化，也面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运作的通俗文化。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科拉克洪在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分析上百种文化定义后得出真知灼见，认为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其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威廉斯认为文化是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倡导文化研究进入日常领域，为文化研究初期的“文化主义”倾向定下了基调，提出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的“文化唯物主义”，显示出强烈的批评精神和深切的现实关怀。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使文化研究超越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局限。欧洲学术界一些学者如汤林森将美国向其他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输出冠之以“文化帝国主义”，这里面当然包括美式Sports以及以欧洲为中心的奥林匹克文化。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等^①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中反对文化的广义定义，认为文化若是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一个多世纪过去，绕来绕去，关于文化的形形色色解释，最终看来用的最多说得最能让人明白的，仍然是泰勒最初的那个定义。这样的文化含义，还是主要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一旦触摸到文化理论流派大师们开拓的思维星空，稍微清醒的人都知道文化定义的问题实在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展开讨论的。选准体育文化研究的切入点，是更棘手的问题。咱采用基本的排除法，问：羚羊的跑、青蛙的跳、黑猩猩的投掷是不是文化？不是。北极熊游泳、狗熊摔跤以及许多动物争夺配偶时的角力竞技，也不是文化。不仅动物的跑跳投不是文化，即使它们的身体活动可以增强体质，这也不是文化；这些可以达到强身健体效果的活动，当然也不能称为体育。体育文化是人类为发展自己身体而创造的文化，其精髓是培育身体的价值体系。需要强调的是，体育文化是建筑在身体活动基础上的文化，无论别的文化是什么，体育文化的起点无法脱离身体，其主要特征要通过身体的教育与训练的过程来凝聚。竞技是检验身体活动后天习得的效果，奥林匹克运动凝聚为体育文化皇冠上的明珠，是人类文化中显示度最高的标识和精华之一。然而，咱们应该牢记，它的基础仍然是身体运动。体育文化研究的切入点找到了：那就是超

越动物本能身体活动的那部分。这也是体育人文社会学超出生物学领域描述人类身体活动的多样性统一提供的独立思维方式。

这里应当明确，“体”不是文化，“育”才是文化。前者是遗传的，后者是习得的。文化的一切方面，从语言、习惯、风俗、道德一直到科学知识、技术等都是后天学习得到的。如果用广义的文化定义来套体育，那么体育就是文化的一部分，结果是说体育就是文化，等于什么也没说。实际上，体育服装、体育场馆、体育器材、体育……这些只是体育文化的物质形态，并非体育文化研究的范畴。体育领域的物质文化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是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文化研究与生产一双球鞋或建造一块田径场显然没太多关系；与体育相关的制度文化虽然也是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各种社会行为规范虽然也可以探讨，但管理“举国体制”一类的事与国内体育文化研究者也离得太远；只有在观念层面通过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精神文化影响社会意识等，尤其在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民族精神领域发挥作用，才是文化研究者施展的广阔天地。

探索体育文化的具体操作，需要避免生硬挪用文化术语作为套用体育无所不包的玄妙命名，摆出自以为是的精英姿态去评头论足或提出一些假命题而鲜有实证性考察分析，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之后又找不出解决之道，将体育文化囿于自娱自乐的“纸面学问”。体育文化研究的最大误区，就是脱离体育，空谈虚玄，下笔洋洋千言，离题遥遥万里，用“文化”来忽悠体育。体育文化研究的前提是以成熟理论的元话语作为有效范式，对于现象的丰富性与事实间的差异性的关注，要求咱们借助文化人类学的经典方法及成果，但又不能停留于毫无批判性思维仅仅耽迷于引经据典搞填空游戏或以书斋里幻想出的概念联系来替代实际体育活动本来的联系。

咱可以天马行空，可以君临天下，可以纵横四海，也可以翻云覆雨、纵横捭阖，但绝不可脱离身体，脱离对身体的培育。在当前体育文化研究的实际工作中，真正的对象相当有限，体育文化研究者够得着的只是很小一块。体育运动的器物层面，可以重复实验揭示客观事实并放之四海而皆准，基本上是自然科学家的掌中之物，成果是科学和技术的结晶，必须全球性的标准化；大部分的操作制度，如竞赛组织、规则及技战术之类，也早已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对其进行文化研究不过是画蛇添足、叠床架屋而已；那么，剩下的主要是观念层面。国内研究体育文化的人群，原来大多是研究体育史出身，古今中外体育史料搜集殆

尽,档案室资料浩如烟海,博物馆持续建设,从历史角度研究文化尝试已十分成熟和精细,创新实属不易。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也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离实践仍嫌遥远,一不小心就有隔靴搔痒之嫌。没有文化人类学的基础,刚上手就是伯明翰学派、葛兰西转向、大众文化理论、后现代主义等眼花缭乱的当代文化重要话题,很难对体育文化本身进行基础性的细致探究。

咱们既然不能像科技人员那样去研究作为体育器物层面的物质条件,也不能像经济学家那样把体育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加以探讨,索性就把握观念层面,从民族传统文化出发的精神领域入手。好在人类学一开始传入中国,就把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对“本土化”的研究统一起来,使中国的研究者既重视少数民族,也关注汉人社区,这与西方人类学最初以“原始族群”和“异文化”为研究对象不同。当前国内体育文化研究者重视本土研究,对采用国际视角比较忽视,人类学背后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性等理念未能真正影响到实际的体育文化研究,存在使用文化人类学相关方法上的某些含混和误解。所幸大家不仅研究少数民族的身体游戏,还研究汉族的传统身体活动习俗,把“民俗体育”、“民间体育”都纳入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范围内。当前,学习人类学对文化进行实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索西方体育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寻求中国的身体文化传统在全球化市场体制中怎样兼收并蓄发扬光大,这恐怕是当前中国体育文化研究者的主要选择。

文化是人化,也就是人的对象化或对象的人化;体育文化作为人类身体活动的特定行为模式,应该承认它的灵魂是人文精神,是人文关怀,是人文价值观。体育文化研究并非可有可无,它关系到对国民性的塑

造,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和平崛起,其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在“更高、更快、更强”的西方弱肉强食竞争观念与人类未来和谐的生态伦理发生冲突的后现代,体现东方智慧的健康休闲观念应该皈依中国体育文化,显现返朴归真的绿色,引领世界新潮。这样的体育,不是政治的附庸,也不是经济的工具,而是为了人的发展——以人为本,以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为本,这才是身体运动知识有效积累和教化育人的体育文化。

献给《体育学刊》出版100期!

参考文献:

- [1] 詹姆逊[美].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2] 泰勒[英]. 原始文化[M]. 连树声, 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 [3] 露丝·本尼迪克特[美]. 菊与刀[M]. 刘锋, 译.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8.
- [4] 达尔文[英]. 物种起源[M]. 舒德干,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5] 达尔文[英]. 人类由来及性选择[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6] 露丝·本尼迪克特[美]. 文化模式[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7]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美]. 古代社会[M]. 杨东莼, 马雍, 马巨,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 [8] 塞缪尔·亨廷顿, 劳伦斯·哈里森[美]. 文化的重要作用: 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 程克雄,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